

朱利安·巴恩斯的 历史书写研究

黄莉莉 著



Julian Barnes



WUHAN UNIVERSITY PRESS

武汉大学出版社

黄莉莉，女，出生于安徽省淮北市，南京大学文学博士在读，阜阳师范大学文学院讲师，研究方向为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

本书为安徽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项目（项目批准号：AHSKHQ2020D08）研究成果

朱利安·巴恩斯的 历史书写研究

黄莉莉 著



Julian Barnes



WUHAN UNIVERSITY PRESS

武汉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朱利安·巴恩斯的历史书写研究/黄莉莉著.—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20.12

ISBN 978-7-307-21949-6

I.朱… II.黄… III.朱利安·巴恩斯—小说研究 IV.I561.074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20)第223237号

责任编辑:李琼

责任校对:李孟潇

版式设计:马佳

出版发行:武汉大学出版社 (430072 武昌 珞珈山)

(电子邮箱:cbs22@whu.edu.cn 网址:www.wdp.com.cn)

印刷:武汉邮科印务有限公司

开本:720×1000 1/16 印张:12.75 字数:189千字 插页:1

版次:2020年12月第1版 2020年12月第1次印刷

ISBN 978-7-307-21949-6 定价:46.00元

版权所有,不得翻印;凡购我社的图书,如有质量问题,请与当地图书销售部门联系调换。

目 录

| | |
|---|----|
| 绪论 | 1 |
| 第一章 朱利安·巴恩斯的历史写作和历史观 | 18 |
| 第一节 朱利安·巴恩斯的历史写作 | 18 |
| 第二节 朱利安·巴恩斯的历史观及相关探讨 | 24 |
| 一、巴恩斯的历史观念梳理 | 24 |
| 二、如何认知巴恩斯的历史观念? | 32 |
| 第二章 朱利安·巴恩斯作品中“历史真实”的呈现方式 | 44 |
| 第一节 文本之内——追寻不在场的真相：解读《福楼拜的 鸚鵡》之一 | 48 |
| 一、追寻真相的起始——寻真之欲与“真”之隐喻 | 49 |
| 二、追寻真相的过程——关于“真”的指涉回环 | 53 |
| 三、追寻真相的结果——揭秘的延宕与“真”之隐匿 | 59 |
| 第二节 文本之外——真实与虚构的转化：解读《福楼拜的 鸚鵡》之二 | 64 |
| 一、从事物到象征——意义的产生与附着 | 66 |
| 二、从作者到叙述者——叙事的拓展和丰富 | 69 |
| 三、从传记到小说——虚实的交融和互补 | 73 |

| | |
|------------------------------------|-----|
| 第三章 朱利安·巴恩斯作品中“历史真实”的世界维度 | 82 |
| 第一节 “世界历史”的文学重构——解读《10½章世界史》 | 83 |
| 一、“世界历史”作为概念和文本的可疑之处 | 84 |
| 二、特殊视角与“10½章世界史”的文学重构 | 90 |
| 第二节 “民族历史”的生产与游戏：解读《英格兰，英格兰》 | 112 |
| 一、“民族历史”概念与文本中的可疑之处 | 113 |
| 二、文学模拟中的“民族历史”生产史 | 116 |
| 三、民族历史循环的可能性——“安吉利亚”的民族新生 | 137 |
| 第四章 朱利安·巴恩斯作品中“历史真实”的个人维度 | 142 |
| 第一节 个人历史的虚构与真实——解读《终结的感觉》 | 143 |
| 一、自我讲述中的重重动机——个人历史叙事中的虚构 | 144 |
| 二、自我讲述的矛盾与突破——“真”与“假”的碰触 | 153 |
| 三、自我讲述的覆盖与重整——个人历史叙事的真实取向 | 161 |
| 第二节 自传写作中的“袒露”与“遮蔽”：解读《无可畏惧》 | 166 |
| 一、自传写作中的“袒露”——有所选择的“真” | 169 |
| 二、自传写作中的“自我遮蔽”——文本的自我指涉 | 179 |
| 三、写作动机和真相诉求——兼论与“新自传”之异同 | 187 |
| 结语 | 191 |
| 参考文献 | 195 |

绪 论

朱利安·巴恩斯(Julian Barnes, 1946—), 英国当代文坛中最具特色的写作者之一, 20世纪80年代因《福楼拜的鹦鹉》《10½章世界史》的出版而获国际声誉, 其作品形式多变, 被称为“英语文坛变色龙”和“小说形式的革新者”^①, 至今已出版多部长篇小说、短篇小说集和散文集, 其作品既具商业热度又获学界关注, 曾获多种文学奖项, 包括1981年的毛姆文学奖, 1985年的杰弗瑞·费柏纪念奖, 1986年的福斯特文学奖, 1993年的莎士比亚奖, 2004年的欧洲文学奖, 并多次进入布克奖短名单, 2011年终以长篇小说《终结的感觉》获布克奖。他的作品既充满艺术创新, 又具有相当的思想性, 学者皮特·契尔兹(Peter Childs)认为他在同时代的一批作家中是“最为多才多艺又最为怪诞的一个”, 同时也“可能是他的时代中最好的思想者之一”^②。

巴恩斯出生于20世纪40年代末, 祖父和父亲分别参加过一战和二战, 而他成长于英国战后物质和文化重建的60年代, 其时美苏冷战达到顶峰, 欧洲经济复苏, 法国青年运动如火如荼: “1968年事件和这一时期的政治骚乱导致了向历史和具体政治的回归。”^③英国国内经济发展平稳, 政治环

^① Vanessa Guignery. *The Fiction of Julian Barnes*. London: Palgrave Macmillan, 2006: 1.

^② Vanessa Guignery. *The Fiction of Julian Barnes*. London: Palgrave Macmillan, 2006: 1.

^③ 琳达·哈琴:《后现代主义诗学: 历史·理论·小说》, 李杨、李锋译, 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 第25页。

境保守，但嬉皮士流行文化盛行，来自法国和美国的后现代主义思潮也不断蔓延，文艺界的标志性事件包括出版《查泰莱夫人的情人》的企鹅出版社被判无罪和被称为“新青年文化先锋”代表的披头士乐队第一张唱片的发行。整个60年代里，这种标志着一种“持异见的、无序的、不断变动的青春文化”大量出现，使时代像“充了电一样被注入能量，令人震惊”，而这个时代也因为开始在法律上承认节育和离婚并使流产和成年男性同性恋合法化而被称为是“新道德”得以逐渐确立的时期^①。复杂的文化环境造就了一批成长中的青年作家，如石黑一雄、伊恩·麦克尤恩、塞缪尔·拉什迪、格雷厄姆·斯威夫特等，他们同巴恩斯一样都在20世纪七八十年代走上文坛，有着战后一代青年作家的共同特征：一方面，复杂的时代和国际环境使他们保持着对于政治事件的敏感，具有强烈的历史和现实意识；另一方面，优越的物质生活和良好的教育，直观感受到后现代文化的冲击，使他们普遍对于先锋文化接受良好，对于自身所处的后现代语境和新道德环境有着充分的参与热情，同时，因为成长期正处于新旧文化和道德体系的博弈阶段，他们对历史和现实中因文化和道德困境所造成的冲突和矛盾，有着充分的感受，最终表现为积极的认知欲和表现欲，这使得他们在走上写作之路后普遍取得了相应的成就。

巴恩斯本人成长于一个文化氛围复杂的家庭，可以说是其时代复杂文化环境的一个典型样本。自幼一同生活的外祖父母年轻时随家庭信奉卫理教派，年老后放弃宗教信仰，外祖母转而支持社会主义国家苏联和中国，母亲成年后主动选择成为激进的无神论者。父母都来自小资产者家庭，且都是法语教师，他们性格严谨，疏于表达情感，奉行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典型的教育理念，因为在政治和文化上的保守和性格强势的母亲坚决的无神论立场，“上帝、政治和性在家中成为绝对禁忌话题”^②，艺术更是在家庭中毫无地位——钢琴是摆设，墙上挂着广告画，收音机和电视机则成为

^① Andrew Sanders. *The Short Oxford History of English Literature*. Lond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4: 601.

^② Julian Barnes. *Nothing to Be Frightened of*. New York: Vintage, 2009: 158.

娱乐新宠。虽然巴恩斯不满父母在文化上的保守，但他们在客观上为其提供了一种特别的文化环境——家中大量的法国文学作品、幼年经常接触法国友人、定期到法国旅游等，这些使得巴恩斯从小对法国文学产生兴趣，并养成了自主读书和独立思考的习惯，进入牛津大学后，他最初选择的是哲学专业，但他很快就(和福柯一样)对哲学的抽象感到厌倦，后转而学习法国和俄国文学。“法国”从始至终都是巴恩斯成长过程中一种重要的次文化环境，在其世界观建构过程中提供了一种超越了其现实生活的文化性、艺术性和跨文化的视角，以至于巴恩斯后来成为公认的“法国控”，法国文化元素总是如“一种无意识的困扰”般出现在他的笔下^①。

然而巴恩斯所接受的法国影响却是有着明确的范围的，即使成长于法国新小说盛行的年代，巴恩斯的文学偶像始终是19世纪的居斯塔夫·福楼拜：“他是一位我愿意认真咀嚼其所有文字的作家，我觉得他已经说出来关于写作的大部分真相”^②。20世纪的法国作家中曾被提及的大约只有萨特、加缪和莫里亚克等人。巴恩斯并不拒绝理性认知方式，从其曾一度选择哲学专业可见一斑，他的作品也充满思辨色彩，其小说经常被称为“观念小说”，但是他对于所有的理论话语形式保持着相当的警惕性，并认为讲述理论是“一种次等的行为”，对于其时流行的理论家列维·施特劳斯、罗兰·巴特、米歇尔·福柯等，他曾在访谈中毫不犹豫地表示不感兴趣，而对于让·波德里亚，更是在《英格兰，英格兰》中对其进行了讽刺性的戏仿，可以说，与某些同时代其他作家对于新锐理论的热情不同，他尽量拉开与理论家们的距离，并明确表示拒绝被贴上“后现代”的标签。与此同时，巴恩斯非常看重自己的作家身份，尤其是“小说写作者”身份，他认为小说是一种“超级虚构”，但是和所有其他文体相比都更接近真相。^③

^① Swanson C. “Old Fartery and Literary Dish”. *The Salon Interview*, 1996(5).

^② Vanessa Guignery. *Conversation with Julian Barnes*. Jackson: University Press of Mississippi, 2009: 15.

^③ Vanessa Guignery. *Conversation with Julian Barnes*. Jackson: University Press of Mississippi, 2009: xi.

从青少年时代一直到成年后，作为一个严肃的阅读者，巴恩斯对于文学和写作始终怀着敬畏之心，他曾尝试过多种和文字有关但更为“实用”的工作，如教师、律师、编辑和新闻记者等，直到1983年，35岁的巴恩斯出版了小说处女作《伦敦郊区》，这部酝酿了八年之久的作品一举斩获毛姆文学奖新人奖，但直到1987年《福楼拜的鹦鹉》获得更多的关注并引发更大的争议之后，他才对自己的能力拥有了足够的信心，从此坚定地走向文学创作之路，并逐渐以此为基础建构了自己的整个精神世界和生活模式。

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因为代表作《福楼拜的鹦鹉》和《10½章世界史》的问世，国外学界开始关注这位作家，各国学者从各种角度分析解读其作品，研究成果多以学术论文和专著的方式呈现，本书在此选择有代表性的专著、批评文集和访谈文集，对外国学界的研究概况进行简单却必要的梳理。

最早的专著来自美国学者梅瑞特·莫斯雷(Merritt Moseley)于1997年所著的《解读朱利安·巴恩斯》(*Understanding Julian Barnes*)，这是“理解当代英国文学”(*Understanding Contemporary British Literature*) 系列丛书中的一部，这一丛书包括当时学者对于金斯利·艾米斯、马丁·艾米斯、多丽丝·莱辛、约翰·福尔斯、格雷汉姆·格林、哈罗德·品特等当代英国作家的最新研究。莫斯雷介绍了巴恩斯的生平和创作经历，按出版顺序逐篇分析其作品，并对当时学界研究现状做了评论和总结，这是最早对巴恩斯及其作品进行全面解读的研究型专著，至今仍具有相当的参考价值。莫斯雷认为巴恩斯在英国当代文学中的成就已经足以将他对自己文学偶像福楼拜的赞誉加诸己身——“他是一位伟大的从来不将相同之书写两遍的天才”^①。莫斯雷尤为关注巴恩斯在小说写作技巧上的创新，他注意到这种文学形式上的求新求变实际上是贯穿巴恩斯整个创作生涯的，他一直尝试用各种方法“背离整个文学传统”，对文体的执着首先表现在对于语言和韵律

^① Merritt Moseley. *Understanding Julian Barnes*. Columbia: South Carolina University Press, 1997: 2.

的精雕细琢之上，他像福楼拜一样，用写诗的态度去写散文，使其“既具冲击力又具个性色彩”，同时也表现在对于形式和结构的刻意追求上，巴恩斯所有的作品都具有精妙而完整的结构，即使是《10½章世界史》和《福楼拜的鹦鹉》这两部在文体上饱受争议的作品，表面上松散无序，实际上却有着“被艺术化融合而成的一个基本结构”，而这种文体实验挑战了传统观念，拓宽了小说的边界，具有“事件性”的文学史意义。同时，莫斯雷还注意到巴恩斯在其匿名出版的侦探小说中做着与其“严肃文学创作”截然不同的事情，它们在技巧上极度类型化且彼此相似，似乎是作者在严肃的艺术性创作之余的一种“休假”，又似乎是巴恩斯对与主流文学圈完全不同的另一种写作生态的全面体验——这种“流行小说”或“类型小说”的作者、接受者和出版方式都更接近底层。但莫斯雷同时认为巴恩斯并非一个空洞的文体家，他具有强烈的人文情怀，在写作中所关注的“并非文学史，并非形式实验，并非现代性困境，而是爱”，同时他也是一位热衷于“提出严肃问题并用小说去求解”的作家，由此而形成的“观念小说”并非刻意表达观念，而是表现出“一位现代的自由思想者”对于复杂性和多元性的清醒认知。莫斯雷的突破在于他不仅关注到巴恩斯最受瞩目的作品《福楼拜的鹦鹉》和《10½章世界史》，而且将其还原到整个创作谱系中考察巴恩斯创作在总体上所表现出的形式特点和主题倾向，总体上，他认可乔伊斯·卡罗尔·欧兹(Joyce Carol Oates)对于巴恩斯的评价，即“他身上体现了‘前-后现代主义者’的人性化和自由思想”。作为美国学者，莫斯雷同时也提供了跨文化视角，注意到巴恩斯所在的英国文学批评界在观念上的相对保守倾向，对巴恩斯具有挑战性的文学实验做出了极高的评价。莫斯雷的这部作品问世较早，只涉及巴恩斯55岁之前出版的作品，但其视野开阔，观点犀利，不失为一部可贵的研究型力作。

布鲁斯·塞斯托(Bruce Sesto)2001年出版的《朱利安·巴恩斯小说中的语言、历史和元叙事》(*Language, History and Metanarrative in the Fiction of Julian Barnes*)按出版顺序，逐步分析了巴恩斯从处女作《伦敦郊区》到政治小说《豪猪》等七部长篇小说，主要聚焦于其语言风格的“优雅和知性”、

其主题中对历史本质等问题的关注、其叙事中的“自反性”等后现代性特征等，是一部尝试用后现代主义理论对巴恩斯作品进行解读的专著。马修·帕特曼 (Matthew Pateman) 在 2002 出版的《朱利安·巴恩斯》(Julian Barnes)，对巴恩斯以真名出版的长篇小说进行了文本细读，关注到巴恩斯在叙事上的创新以及在主题上对爱情、真相、讽刺、友情与背叛、信仰、政治与艺术等问题的思考和表达。帕特曼认为，巴恩斯一直在细腻而逐步地推进着小说这一文体方式，使其具备更充沛、更丰富的表现力，巴恩斯也因此在英国当代文学史上具有相当的重要性。弗雷德里克·霍尔莫斯 (Frederick M. Holmes) 在 2009 年出版的《朱利安·巴恩斯》(Julian Barnes) 中，则将巴恩斯的长篇小说按照主题进行分类，如将具有自传色彩的《伦敦郊区》与同样表现作家成长的《亚瑟与乔治》进行比较分析，将同样具有强烈历史意识的《福楼拜的鹦鹉》《10½章世界史》和《英格兰，英格兰》进行比较分析，将以爱情为主题的《商榷》《她遇到我之前》和《爱及其他》进行比较分析等，这种独特方式深入阐释了巴恩斯长篇小说中的重要命题及其发展变化，令人印象深刻，但同时也一定程度上流于刻板。值得一提的是万妮莎·吉盖里 (Vanessa Guignery) 在 2006 年出版的《朱利安·巴恩斯小说研究》(The Fiction of Julian Barnes)，这是一部构思精妙的著作，它在前言和结语之间有十章——分别评论了巴恩斯在 2005 年前出版的全部虚构性作品，包括长篇小说、短篇小说和一个“插曲”（“插曲”是对巴恩斯散文作品的评论），全书在结构上模仿了《10½章世界史》，是研究者对巴恩斯小说代表作的致敬，独具匠心地表达了研究者对于巴恩斯的总体看法——“他既对小说文体有着重要的开拓，也是一位出色的散文写作者”，作者对巴恩斯的创作经历进行了更为细致的梳理，并充分意识到巴恩斯在写作中呈现出的“多样性”(hybrid)这一特点，然而这本书更大程度上可算是一部出色的研究成果综述，作者在各章节中对学界研究进行了较为全面的概括和总结，因此具有相当的参考价值。

另外万妮莎·吉盖里作为研究巴恩斯的专家，在 2009 年还曾与瑞恩·罗伯特 (Ryan Robert) 合作编辑出版过一本巴恩斯访谈录《朱利安·巴恩斯

访谈录》(*Conversations with Julian Barnes*)，这本书收录了18篇文章，包括1980年至2007年巴恩斯接受的各种采访记录，正如编者所言：“巴恩斯从写作生涯的开始就是一个非常慷慨的受访者”，虽然他对文学理论和文学批评不感兴趣，在谈话中却很乐意与人分享自己的文学观点和创作经历，同时，作为一位对于私人生活表达比较低调的作家，他在访谈中也多次对自己的成长经历和家庭关系有所吐露，对于读者和研究者全面了解作家有相当的参考价值。

除了这些专著和访谈文集之外，一些有代表性的学术论文被以批评论文集的方式集结起来，譬如契尔兹于2011年编辑出版的《朱利安·巴恩斯：当代批评视角》(*Julian Barnes: Contemporary Critical Perspectives*)，托里(E. Tory)和维兹特果(J. Vesztergo)于2015年编辑出版的《陷入不确定性：朱利安·巴恩斯小说研究论文汇编》(*Stunned into Uncertainty: Essays on Julian Barnes's Fiction*)等，在这些论文集里，研究者们多从主题研究、形式研究和影响研究这些方面切入巴恩斯作品从而对其进行讨论和解读。

首先，主题研究是巴恩斯研究的重点。研究者们多考察巴恩斯作品中的宗教、死亡、爱与婚姻、艺术与现实的关系等主题。较有代表性的论文如学者安德鲁·泰特(Andrew Tate)就巴恩斯一系列小说和传记作品中的宗教观念和宗教母题展开讨论。泰特注意到，在整个英国经历了宗教衰落和巴恩斯本人也并无宗教经验的背景下，“上帝问题却以一种令人惊讶的方式出现在这个宣称抱持无神论世界观的作家几乎所有的作品中”^①，同时，巴恩斯的虚构类作品也很难像马丁·艾米斯和伊恩·麦克尤恩作品一样被归类为“新伦理小说”，身为写作者，他表现出一种“强烈的怀疑主义的敏感性”，而他的小说则勾画出一个遍布“偶然性、创伤和荒诞”而同时又对“神性、奇迹、未知和来世”充满焦虑的世界。以小说《凝视太阳》(*Staring at the Sun*)为例，泰特指出其中的核心意象“向天空呐喊”暗示着在“上帝缺

^① Sebastian Groes, Peter Childs. *Julian Barnes*. London: Continuum International Publishing Group, 2011: 52.

席”状态下人对生存意义和精神慰藉的困惑和渴望，揭示出现代人的生存困境，而小说的另一个核心意象“平凡的奇迹”(ordinary miracles)则隐喻着人在神性缺失的世界中创造意义的微弱可能性。在巴恩斯作品中，此类具有宗教内蕴的意象比比皆是，其作品总是激荡着“一种对奇迹和神秘的激情”。学者皮特·契尔兹就巴恩斯小说中的死亡主题展开讨论。他发现巴恩斯的短篇小说集《柠檬桌子》和《脉搏》中有大量以“衰老”和“死亡”为主题的故事，而他在自传《无可畏惧》中也大量展开和死亡相关的话题，综合考察这些文本之间的关系，契尔兹指出，巴恩斯对死亡主题有着持续的关注，在自传中他不断深化对相关问题的思考，在小说中，他执着于描写人在面对不可避免的彻底消亡这种结局时的挣扎和痛苦，而这种思考和写作的基础在于——“质疑衰老的符号和死亡的必然性可能只是一种小小的叛逆，却是一种本能的和最为关键的对于宇宙基本秩序的叛逆，是促使巴恩斯创作《柠檬桌子》的基本动力，也是他后来写作其自传的根本动力”^①。莫斯雷曾考察巴恩斯小说中的爱情与婚姻主题，他注意到巴恩斯对于婚姻之中的爱情关系尤为关注，他大量描写婚姻中的“不忠、通奸和背叛”，而他笔下的男性总是沦为这种情感关系的牺牲品，莫斯雷指出，在中世纪和文艺复兴以来的文学传统中，“被背叛的丈夫”要么成为“被嘲弄”的喜剧笑料，要么成为一种缺乏“弹性的”、为“自我正义”而战的复仇者形象，二者都是为维护父权制而存在的模式化文化表征，而巴恩斯完全打破了这种刻板的类型化的传统，他用更加真实也更加残酷的方式去描写男性在遭遇情感背叛时的心理失衡，一种“思虑万千和无从暴力”的“既不愚蠢也不傲慢”的状态，而这正是巴恩斯对于人的情感和心灵之复杂性的深入体会和表达，也是巴恩斯在创作中“对人的心理和人的激情持续关注”的具体表现。^②

^① Sebastian Groes, Peter Childs. *Julian Barnes*. London: Continuum International Publishing Group, 2011: 103.

^② Merritt Moseley. *Understanding Julian Barnes*. Columbia: South Carolina University Press, 1997: 13.

其次，因为巴恩斯对形式创新的执着和对文体实验的热衷，形式研究在巴恩斯研究中也占很大比重。研究者多从巴恩斯作品的文体、语言和结构等方面入手，分析其文体颠覆、文体模仿、元小说、互文性、复调性等创作方式的具体表现。《福楼拜的鹦鹉》在问世之初，作为一本“跨文体之书”(hybrid book)，因挑战了传统的文类划分而引发学界讨论，巴恩斯研究专家万妮莎·吉盖里对这次讨论进行了细致考察并提出其看法，针对学界对于《福楼拜的鹦鹉》缺乏整体性和连贯性而不能称其为小说的观点，她指出，文本表现出的这种“不可能的提喻之旅”^①正是一种“刻写在后现代主义者身上的美学”，它崇尚碎片化和多元化，并对“整一性”有着天然的抗拒，福楼拜的作品细节和生活细节被混织并置，以此对抗和拒绝着“成为完整”，这不仅导致文体的跨越和混乱，而且“打破了自柏拉图以降的西方而上传统中极为重视的对虚构和非虚构之区别的清晰界定”^②。和莫斯雷一样，评论家阿兰·克林顿(Alan Clinton)也注意到巴恩斯匿名创作的侦探小说，他认为这是具有清晰文体意识的巴恩斯所做的另一种文体实验，其目的是用以“试探其创作的边界之所在”，他关注到巴恩斯在尽力采用传统侦探小说和恐怖小说技法的同时还努力地创造出了另一个“作者”卡瓦纳(Kavanagh)，其生平和经历煞有其事地出现在“作者小传”中——与巴恩斯本人的真实状况自是大相径庭——卡瓦纳甚至有着独立的文学观念，他认为文学的价值潜藏在所谓的“低等”文体中。克林顿认为“巴恩斯-卡瓦纳”这一组合“明确保持了作者的两重身份的分化和独立”，巴恩斯以其本名创作他所认为的“高贵的、高等级的、主流的、文雅的小说”，而卡瓦纳自1987年之后再未出现，意味着巴恩斯已经明确了自己的创作之路。^③但是万妮莎·吉盖里撰文表示在巴恩斯2005年出版的《亚瑟与乔治》中，侦探

^① Vanessa Guignery. *The Fiction of Julian Barnes*. London: Palgrave Macmillan, 2006: 41.

^② Vanessa Guignery. *The Fiction of Julian Barnes*. London: Palgrave Macmillan, 2006: 1.

^③ Vanessa Guignery. *The Fiction of Julian Barnes*. London: Palgrave Macmillan, 2006: 30.

小说的元素一再出现，文本充满“福尔摩斯故事中的探案驱动力和悬念的揭秘”，同时，“身为真相发现者和正义捍卫者的阿瑟爵士与身为小说作者的柯南道尔二者之间的界限被打破，于是一系列元小说特征由此出现”^①。

再次，巴恩斯作品中大量的法国元素不断引发研究者从影响研究角度去考察他的创作和文本。万妮莎·吉盖里在《高卢物事偏爱——巴恩斯的法国连接》一文中详细梳理了巴恩斯在其小说和散文作品中表现出的他与法国文化和法国文学之间的关系，指出巴恩斯从英国人视角审视法国传统并将自身置于其间不免具有“浪漫主义和理想主义的色彩”^②，但在围绕巴恩斯与法国散文传统、读者经验和写作的互文性、文学的传统与创新等问题展开详细论述后，吉盖里认为这总体上是一种良性的影响，因为在这种“持续性的、丰富多彩的、温和的与19世纪法国文学之间的对话”中巴恩斯逐渐明确了其个人风格并确立了文化身份，他指出巴恩斯“通过对于特定文本的欣赏，意图打磨文学的历史，并给予它第二次生命”^③。吉盖里的评价是客观而全面的，她尤其注意到巴恩斯在接受影响与意图创新之间的挣扎以及他最终呈现出的一种难得的均衡。马修·汤顿(Matthew Taunton)在《漫游者与拥有者——巴恩斯小说中的巴黎与伦敦》一文中，以《伦敦郊区》为例考察巴黎与伦敦这两座城市在小说中的文化隐喻和象征意义。汤顿借鉴本雅明对于波德莱尔的评价，指出“巴黎”这个“漫游者之家”在小说中既代表着60年代的青年运动对无边界性爱、社会和政治自由的幻想和渴望，也隐喻着青年巴恩斯对于法国文学中“流放的法国叛逆作家”在精神上的向往，而这正是他在此后的写作中进行后现代元小说创作的文化起点，在《伦敦郊区》这部小说处女作中，作者在一种“高度的自我意识”中大量引用的文学经典涉及兰波、戈蒂耶、左拉、马拉美和波德莱尔，其中最为重

^① Vanessa Guignery. *The Fiction of Julian Barnes*. London: Palgrave Macmillan, 2006: 130.

^② Vanessa Guignery. *The Fiction of Julian Barnes*. London: Palgrave Macmillan, 2006: 39.

^③ Vanessa Guignery. *The Fiction of Julian Barnes*. London: Palgrave Macmillan, 2006: 49.

要的是波德莱尔，因为正是在他的诗歌和散文中，一种“无根的现代性的生活”被描摹成幽灵般的“瞬息万变、难以捉摸、不可预料”，这是19世纪末法国最有启示性的文化意象，这种“不断移动的漫游者”意象既是巴恩斯小说中少年主人公用以对抗小资产阶级文化价值观之平庸刻板的武器，也是其成年之后远离和抗拒的精神陷阱。

国内学界对巴恩斯的关注较晚，1990年的《文化译丛》杂志中可见英国学者杰伊·帕里尼的一篇译作《当代英国小说界一瞥》，其间简要提及巴恩斯在当代英国小说中的地位 and 影响。2001年的《外国文学动态》曾刊发王青松的《朱利安·巴恩斯出版新作》一文，这是最早对巴恩斯出版动态进行报道的文章。此后随着巴恩斯代表作被翻译成中文进入中国读者视野，学界对他的关注和研究才逐渐兴起，总体来看，近年来，国内学界的巴恩斯研究可划分为如下专题：第一，后现代主义艺术形式研究。国内学界对巴恩斯最大的兴趣之一来自他对于小说艺术形式的探索和开拓，如杨金才、王育平在《诘问历史，探寻真实——从〈10½章人的历史〉看后现代主义小说中真实性的隐遁》一文中以巴恩斯代表作《10½章世界史》为例，分析巴恩斯作为后现代主义小说家代表在写作中表现出的“文类和文体的杂糅性”特点。张和龙在《鹦鹉、梅杜萨之筏与画像师的画——朱利安·巴恩斯的后现代小说艺术》一文中以多部作品为例，考察巴恩斯作品中元小说、自反性、戏仿、互文性等后现代主义艺术特征，着重分析“对不同文类，不同艺术门类之间的互文性”，对巴恩斯“非本质主义的后现代艺术观”有所揭示。聂宝玉在《不可靠叙述和多主线叙事——朱利安·巴恩斯小说〈终结感〉叙事策略探析》一文中对《终结的感觉》中的后现代叙事技巧展开讨论，认为“凭着不可靠的叙述(者)和多主线交错的立体叙事等叙事策略对记忆的颠覆消解，巴恩斯的小说《终结感》达到了后现代语境下叙事技巧和主题的完美统一”^①。王瑾、张海榕在《忠诚抑或背叛——评朱利安·巴恩斯小

^① 聂宝玉：《不可靠叙述和多主线叙事——朱利安·巴恩斯小说〈终结感〉叙事策略探析》，《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学报》2013年第10期。